

# 改革开放 40 年历史学科新发展： 思想解放与体系建设

2018 年 10 月 13 日-14 日,“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历史学学部 2018 年度工作会议暨新领域新问题新方法  
与历史学科的发展研讨会”在浙江大学召开,40 多位学者就本次会议的学术议题“新领域新问题新方法  
与历史学科的发展”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讨。与会者大多着眼于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史学在新领域、  
新问题、新方法方面的发展趋向,进行总结与反思。从会议的研讨内容可以看到,中国的历史研究正在把中国史研究和世界  
史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中国史学在环境史、城市史、科技史、公众史学等新领域研究的开拓方面也取得了长足  
进展,中国的历史研究者正在深入地反思近代以来中国史学走过的艰难历程、历史研究的现状特点以及应该汲  
取的经验教训。这里发表几位学者在会议上的发言,他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上述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特约主持人 张越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与谈人:

马克垚: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姜义华: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钱乘旦: 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

苏智良: 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教  
授、博士生导师

## 四十年来中国的世界古代史研究 的发展变化

□马克垚,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年,中国的世界古代史研究可以说是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过去依靠西方学者的著作、翻译进行研究,达到使用原始资料进行研究  
的水平,可以和外国学者折冲樽俎、辩道问难、不相上下。1977、1978 级入学的学生,如今已经成长为这一领域的骨干、领军人物,主要是他们带领世界古代

史学科达到这个水平的。这一发展的过程,上古史与中古史领域又有不同,所以分别叙述。

上古史从一开始就建立培养人才的基地。林志纯先生倡议,经教育部特别立项,在东北师范大学建立了古典文明史研究所,从国外聘请教师,培养掌握埃及象形文字,两河流域楔形文字,希腊、拉丁文字和语言的学生,并送他们到国外进修、深造。其中的许多人已经学成归国,除在东北师大教学、研究外,逐渐也辐射到全国各高校。在北大、南开、北师大、武大等高校,也出现了相关学者,进一步培养出更多的人才。其后世界古代史的翻译著作、



论文、专著大量涌现。林志纯先生主持编纂的《世界上古史纲》(两卷本),用城邦—帝国理论阐释古代世界的发展规律,可谓开风气之先。刘文鹏穷毕生之力,写成《古代埃及史》、《埃及考古学》,是力图总结埃及学方面的力作。新一代学人从原始资料出发写成的研究著作,则有郭丹彤的《埃及与东地中海的交往》、于殿利的《巴比伦法的人本观》、国洪更的《亚述赋役制度考略》、李政的《赫梯条约研究》、黄洋的《古代希腊土地制度研究》、杨共乐的《罗马社会经济研究》、晏绍祥的《荷马社会研究》等。原始资料的翻译也十分丰富,希腊罗马的原始资料,因为有 Leob 古典丛书的集成之作,可以说是几乎全部译出,苗力田主持完成了《亚里士多德全集》的翻译和出版,罗马法的《法律大全》也由中国政法大学的《民法大全选译》译出很多。东方各国的原始资料有郭丹彤《古埃及象形文字文献译注》、吴宇虹《古代两河流域楔形文字经典举要》、李铁匠《古代伊朗史料选辑》等。西方学者的重要著作翻译出来的就更多了,像奥姆斯泰德的《波斯帝国史》、蒙森的《罗马史》、哈蒙德的《希腊史》、库朗热的《古代城邦》、罗斯托夫采夫的《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塞姆的《罗马革命》、林托特的《罗马共和国政制》、芬利的《古代世界的政治》等,特别是近年来出版了意大利学者马尔蒂诺写的《罗马政制史》(已出两卷),俄罗斯学者库济辛主编的《古希腊史》,还有古代晚期讨论兴起后,反映这方面观点的希瑟《罗马帝国的陨落》、奥康奈尔的《新罗马帝国衰亡史》等,《剑桥古代史》(第二版)共 14 卷 19 册已经翻译完成,估计可以陆续出版。

当然,上古各分支学科发展不平衡,希腊、罗马方面,无论是研究著作还是翻译都比较多,而埃及、两河流域、赫梯、波斯、印度等地的研究著作和翻译都比较少,这是应该加以改进的。

中古史方面,则没有上古那样的集中发展条件,而是遍地开花,自动成长。新一代学人,掌握中古拉丁语、古英语、中古法语、中古德语的人才,也陆续出现,一些学者更研习阅读手稿。根据这些原始资料写出的著作,也出版了许多,像彭小瑜的《教会法研究》、刘城的《英国中世纪教会研究》、

朱孝远的《神法、公社和政府:德国农民战争的政治目标》、孟广林的《英国封建王权论稿》、李云飞的《中古英国庄园制度与乡村社会研究》、黄春高的《分化与突破:14-16 世纪英国农民经济》、蔺志强的《在专制与宪政之间:亨利三世时代的英国王权运作》等。翻译的原始资料,和上古史比较起来,可谓相当稀少,有戚国淦的《法兰克人史》、寿纪瑜的《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陈维振等人的《英吉利教会史》等,像夫瓦沙的编年史、巴黎的马太的编年史,都没有翻译。著名的“撒利克法典”和查理曼的“庄园敕令”,都是根据苏联学者格拉青斯基的俄文转译的。阿奎那的《神学大全》和《反异教大全》,因为是宗教著作,所以有段德智为之译出。法律著作译出的有格兰维尔的《论英格兰王国的法律和习惯》,勃拉克顿和布曼诺阿的大部头法学著作则没有翻译。但是西方学者的名著翻译出来的倒不少,张绪山专门从事翻译名著,他译出了布洛赫的《封建社会》《国王神迹》,还有冈绍夫的《何谓封建主义》。译出的著作还有拉杜里的《蒙塔尤》、勒高夫的《圣路易》、贝内特的《英国庄园生活》,康托洛维茨的《国王的两身体》等。7 卷 8 册的《新剑桥中古史》的翻译也在进行中。

中古史研究、翻译工作方面的不平衡则更为突出,广阔的印度、阿拉伯、东欧地区,有关著作可说寥寥无几。我知道的阿拉伯地区原始资料有马苏第的《黄金草原》,著作有哈全安的《阿拉伯封建形态研究》,俄国则有朱寰译出原始资料《往年纪事》,克柳切夫斯基的《俄国史教程》也全部译完。其他周边国家和非洲等有许多空白还需填补。

理论问题的讨论,在打倒“四人帮”以后,也一时称盛。苏联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在二十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讨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由于破除了斯大林教条主义的束缚,这一次讨论众说纷纭,对五种生产方式的定论提出许多疑义。我国学者知晓后,也展开热烈的讨论。有人主张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原始社会,也有人主张是特殊的东方社会。有人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建立五种生产方式的理论,是斯大林才确立了这一说法。也有人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就是主张五种生产方式的。

因为破除了一元单线的社会发展论，所以有人认为奴隶社会没有普遍性，奴隶社会在历史上是否存在也成了问题。这一讨论虽然没有得到确定的结论，但是起了解放思想的作用。

第二个讨论的问题是城邦问题。林志纯先生提出古代国家普遍存在由城邦到帝国的发展路径，意在批判东方专制主义论。东方专制主义论者认为，东方专制、西方民主，自古而然。西方由城邦民主制到近代民主制，一脉相承，而东方则一直是君主专制制度。如果世界各国古代都存在城邦民主，则西方也就不能独占民主桂冠了。讨论又涉及何谓城邦的问题，有的人仍然以希腊城邦为唯一之城邦标准，有的则从世界范围探究城邦的定义。不少人主张古代各国城邦的普遍存在，也有人持不同意见。在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译出后，更展开新一轮的讨论与批判。这一讨论，对于中国学者批判西欧中心论、批判东方专制主义，建立我们自己的世界史理论体系，应该说有所助益。

第三个讨论的是封建社会和封建化问题。1980年，刘昶提出中国封建社会之所以长期延续，就是因为没有完成封建化。刘昶按照当时教科书上的标准，认为封建化就是土地庄园化、农民农奴化、政治多元化，而中国历代的农民起义，不断打断封建化的进程，使社会又回到原来的起点上，所以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刘昶的观点引发广泛的讨论，讨论的问题主要是农民起义的作用和中国是否完成封建化。前一个问题，很少有人赞成刘昶的观点，大多数人仍然认为农民战争打击了封建统治，是中国社会进步的动力；后一个问题，则不同的意见很多，涉及到何谓封建化，中国是否完成了封建化，是否应该将西欧的封建化作为衡量中国等其他国家的标准。在介绍了西欧的封建社会、封建化概念后，这个问题得到一些澄清。后来，冯天瑜作《封建考论》，又引起封建名实问题也就是中国有没有封建社会的争论。冯天瑜认为要区分封建的西义和古义，西义就是封君封臣制，古义就是封邦建国，西义和古义有相似性，但是中国秦汉起已经实行郡县制，和西欧的封建制不同，所以说秦汉以后是封建社会和封建的本义相背离，不能成立。李根蟠主张中国有封建社会，认为中国的封建概念不断发生变化，

从封邦建国到秦汉的封土而不治民，已经发生了变化；近代以来，又发生了两次变化，一次是严复把西欧的 feudalism 和中国的封建对译，第二次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将封建社会看作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生产方式之一。中国的封建社会比西欧的更发达、更先进，也更具典型性。马克思也主张东方和西方都存在封建社会。

这些问题的讨论，吸引广大老、中、青学者参加，对解放思想、推进历史学理论的建设，特别是建立中国本位的史学理论和观点，起到很好的作用。可是，相当一段时间以来，史学的发展似乎显示出另外的趋向，一方面，研究不断深化，无论中国史和世界史，都从史料出发，深耕细究，爬罗剔抉，刮垢磨光，写出了许多好作品。世界史的这一发展尤其值得祝贺。但另外一方面，对大的历史问题、理论问题的讨论比较少见了。例如，虽然布洛赫、冈绍夫的书都已翻译出版，但封建主义的讨论没有再深入进行下去。中国史方面，似乎大多数人认为，秦统一之后，废封建、行郡县，中国就没有封建了，也不需要再讨论了。世界史方面，还能追踪世界封建主义研究的进程，介绍许多学说和观点，如布郎、雷诺兹对封建主义的质疑，杜比提出、后来讨论的封建革命说，比森的领主制理论，以及15世纪后的变态封建主义等。不过缺乏深入研究、提出我们自己的成果。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问题，则偶有论文，也缺乏深入研究成果。

古代晚期研究在西方兴起，有一大批学者从事，出版大量论文、著作，还发行了有关杂志。此说主要是反对罗马帝国晚期衰亡的理论，发掘新史料，利用文献、考古材料，说明罗马晚期还相当兴盛。经济上继承皮朗命题，扩展“没有穆罕默德就没有查理曼”的说法，政治、文化上，则利用新材料，证明罗马晚期依然政治稳定、文化繁荣。也否定中世纪早期是黑暗时代的意见。这样将罗马晚期和中世纪早期连在一起，并称古代晚期。日耳曼人问题在古代晚期的讨论中，形成新的学说。在批判了反动的种族优越论之后，有人主张民族也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改变，提出族群生成理论，认为日耳曼族群的形成，是其军事领袖、精英们，通过自己的胜利形象，吸引其他普通群众，形成更大的族群，最



终建立了国家，这就是日耳曼诸国的由来。也有人反对族群生成理论，认为依靠记忆是不会吸引群众形成族群的。有人甚至主张，日耳曼人的统一意识、共同起源、各种政治联合，都不能证明他们存在过族群，所以历史上统一的日耳曼人是否存在，也成了问题。与罗马人对立的日耳曼人的消失，使中世纪史研究留下了巨大的空白。这一新发展在我国介绍相当详尽，但讨论者却寥寥无几。

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在我国曾经热烈讨论，改革开放以来，这一讨论剔除教条主义影响，风光不再。近来美国加州学派提出中国18世纪时并不比西欧落后，正好连接原来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弗兰克的《白银资本》和彭慕兰的《大分流》出版后，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及时组织过讨论，当时还有吴承明先生参加。不久这两本书都翻译出版，但我国的讨论却并不热烈，出现的情况是彭慕兰和黄宗智（美籍华人）两个外国人在我们的《历史研究》杂志上进行讨论，而中国学者参加不多。

总的说来，中国的世界古代史学科，四十年来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和世界史坛的强者比较，还有较大差距。要和这些强者一较短长，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现在存在的问题是：其一，世界史学者的数量明显太少。社科院世界史所，原有研究人员二百余人，现在只有过去的一半，百十来人，而且按规定还只能保持八十人，留二十以备引进人才。北京大学历史系原来有在编人员一百余人，中国史、世界史各占一半，所以世界史人员可达六十人。现在历史系只有在编人员六十来人，世界史也还大约保有一半数量，所以只有三十来人。总体看规模太小。其二，素质有待提高。掌握两、三门古代外语，三、四门现代外语，又掌握本专业相关理论、具备史学素养的人才，还不是很多。这需要各研究机构、各高校大力培养和引进。其三，中国的世界史学者和中国史学者互不关心。这一现象由来已久，但对中国历史学科的发展没有好处。如果这一步都走不出去，如何进行跨学科研究呢？我认为双方应该相互关心，互相学习，共同提高。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时代，我们历史科学工作者，应努力奋斗，到世界史坛上发出我们的声音，建立我们的理论体系，树立我们的学派，做出无愧于伟大时代的业绩。

## 改革开放40年：伟大的解放运动和史学的解放

□姜义华，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实现了从传统生产方式和传统生活方式向现代生产方式和现代生活方式的伟大飞跃。中国告别了传统立足于手工劳动的农耕文明，告别了传统的用牛、马和人去耕种土地的生产方式，走进了工业文明时代，并已开始向信息文明跨越式发展。中国又在大力建设生态文明，谋求融新型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生态文明为一体，全面统筹、有序推进。中国40年来这一史诗性的成就，名副其实地是一场用和平方式进行的伟大革命，是全体中国人更全面更深入的伟大解放。

### 劳动的解放、人的解放与史学的解放

40年来的解放运动，首先是劳动的新的解放，劳动力的新的解放，人的新的普遍的解放。

劳动的新的解放首先是亿万农民的解放。1927年3月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这里所说的“束缚他们的罗网”，主要指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几万万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用了差不多22年时间，终于冲决了这四大罗网，夺取了中国革命的胜利。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包括几万万中国农民在内的中国人民政治上得到了解放。

为了从传统的生产方式和传统的生活方式中走出来，中国尽力发展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技术，也取得了不容忽视的成绩。但是，直到1978年，中国9.6亿人口中，农民仍占82%，有7.9亿，他们虽然不再是传统的个体经济，但主要仍从事手工劳动；城市人口1.7亿，仅占18%。其

中第二产业从业人员，包括工人、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共 0.69 亿，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仅 0.49 亿。这一事实表明，中国人民，尤其是人数最为广大的中国农民，还没有从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中解放出来，还被牢牢束缚在土地上。

改革开放是从承认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合理性、合法性开始的。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推行，数亿农民有了独立自主地进行生产、流通、消费的权力，劳动的主动性、积极性得到极大的释放。大批农业劳动力得以从原先土地的束缚下、从城乡固化了的户籍制度和社会二元结构中解放出来，有了迁徙的自由和选择职业的自由，纷纷从农业转向工业，从农村进入城市，给制造业、服务业和城镇快速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活力、动力。

乡镇工业和相关企业如雨后春笋发展起来，至 1988 年就创造了将近 1 亿个就业岗位。其后，它们一直相当稳定地容纳着 1.1 亿至 1.2 亿农民工。从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农民工更成千万、成亿地涌入城市，成为现代城市发展的生力军。2017 年，全国就业人口 7.76 亿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口 4.25 亿人，而农民工就有 2.87 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 1.72 亿人，本地农民工 1.15 亿人。这些农民工以辛勤的劳动，低廉的工资，对各种新兴产业创造性参与，和城市原有居民一道艰苦奋斗，将中国在短时间里打造成世界工厂、第一制造业大国。

虽然农民工在身份上的解放还没有最终完成，但工农之间、城乡之间劳动的藩篱就此打破。农村积累的迅速增加，农民生活的迅速改善，大大加速了农业机械化进程。2017 年中国耕种收农机化综合水平达到 66%，绿色农机化技术推广成效明显，农业生产方式实现了由人力畜力为主向机械作业为主的历史性跨越。

正是中国农民改革开放以来伟大的新的解放，推动历史学对中国农民、中国农村、中国农业过去和现状的全面反思，大大拓宽了研究的视野，订正了先前具有很强实用性与片面性的评价，对中国传统的农耕文明、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中国古代与现代的农民进行比较客观、深入而全面的研究。

劳动的解放、劳动力的解放，另一重要表现，就是冲破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各种藩篱。不仅

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里的脑力劳动得到尊重，人文社会科学、管理科学领域里的脑力劳动也得到尊重。理论的解放、思想的解放都能够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中国广大知识分子的创造力和无穷潜力爆发出来。在 40 年来历史研究中，对知识分子的研究之所以成为一个重要的热点，和这一伟大实践紧密联系。随着改革开放，原先被视为消极因素的社会成员变为一支异常积极的社会力量，在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积极作用。这一重大的变革，推动历史学更认真、更加实事求是地研究和评价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真实状况以及它们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

#### 土地、资本、市场等要素的解放与史学的解放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国的工业化、信息化，中国空前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快速的城镇化，中国超大体量的公共供给和公共服务，都需要巨额的资本投入。西方许多国家资本的原始积累，是通过剥夺本国农民和肆无忌惮地掠夺广大殖民地而完成的，航海带来的全球贸易，美洲、非洲等地黄金的发现，给西方资本原始积累注入强大活力；现今，他们则凭借金融资本和核心技术的垄断地位以及世界范围无远弗届的广泛渗透，继续攫取高额利润，变本加厉地扩大资本的积累和积聚。这两条路在中国都走不通。剥夺本国农民，那只能激起农民的激烈反抗，堵塞走向现代化的道路；对外侵略扩张，中国素来没有这样的传统和基因。中国资本的原始积累以及其后资本的积累与积聚，依靠的是广大农民所耕种的土地的解放、本国既有国家资本及民间资本的解放，以及通过开放互利大量引进外资、侨资、港资、台资。而所有这些，又都和市场的解放紧密联系在一起。当市场真正获得开放的时候，不仅产品、劳动可以进入市场，而且土地、国家资本进入了市场，知识、知识产权随之也进入了市场，除去极为广大的国内市场，还有极为广大的国外市场。国家的土地、农民的土地可以进入市场流转，为中国资本的积累积聚提供了极为可观的第一桶金，并为大规模引进外资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资本和市场的解放，可以说是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最为石破天惊的突破。很长一段时间中，资本和

市场都被视为和社会主义绝不相容，改革开放，彻底打破了这种迷思。实践证明，资本和市场，可以用来服务于资本主义，又何尝不可以服务于社会主义！实践证明，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的拓展与成熟，市场积极参与资源的合理配置以及逐步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有效地降低了生产与流通的成本，提高了生产与流通的效率，能够更为充分地实现劳动者的劳动价值，更为充分地满足人们多样化的乃至个性化的各种需求。

在中国，资本的解放最初是从放开民营企业开始的。民营资本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极为快速的发展过程。到2015年底，全国民营企业已达1908万户，民营企业投资人3560万人。企业数占全国企业总数的87.3%；注册资金90.55万亿元，占全国实有企业注册资金的53.8%。这些企业吸纳了2.92亿从业人员，成为我国劳动解放、劳动力解放的巨大推进器。这些企业已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60%，税收占全部税收的比重超过50%，新增就业比重更超过90%，在支撑增长、增加税收、扩大就业、促进创新等方面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的解放，本质上都是人自身的解放，是积累起来的劳动的解放，是从事工匠型劳动、知识型劳动、管理型劳动的各种劳动力的普遍解放。

40年来中国改革开放这一方面的全部实践，对中国历史学来说，具有一种颠覆性的大解放的意义。长时间以来，在我们的历史研究中，土地问题研究，一直和土地改革运动的实践直接联系在一起。而对资本的研究，则一直要从属于消灭资本主义、使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在中国绝种的现实需要。40年来，我们重新考察中国历史上包括近代以来土地制度、土地关系、土地利用的变迁，重新考察中国历史上特别是近代以来资本、资本主义、资本人格化的真实状况，推动了中国经济史、政治史、社会史及文化史研究的全面突破。

#### 生产力的大解放与史学的解放

劳动的解放、土地的解放、资本的解放、市场的解放，都是生产关系的伟大变革，这些解放的目标和必然结果，就是社会生产力的巨大解放。

近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已经经历了四次工业革命，在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发展中走在世界前列。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主要标志是机械化，用机器生产普遍取代手工劳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主要标志是电气化，即电力的广泛应用；第三次工业革命主要标志是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和空间技术的广泛应用，涉及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技术、空间技术和海洋技术等诸多领域；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主要标志是智能化与信息化、绿色与生态，是数字技术、物理技术、生物技术的有机融合。

中国生产力的解放，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四次工业革命分区、同步甚至并轨进行。改革开放前，中国手工劳动还非常普遍，机械化程度还不高。1978年到1988年，乡镇工业勃兴，主要属于劳动密集型，基本属于原始工业化阶段，但它激发了对电力、机械制造、钢铁、采矿和交通运输的巨大市场需求，极大地推动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实现，同时引发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广泛开展，使钢铁、煤炭、铁路、机器、通讯设施、轮船、汽车等工业遍地开花，中国各地争先恐后进入一个新技术大爆发时代。这两大工业革命尚未全面实现之时，中国又马不停蹄地开始了第三次和第四次工业革命，一方面在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技术、空间技术和海洋技术等诸多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另一方面在新世纪刚开始就确定要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行绿色发展战略，进行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绿色投资，包括生态建设、环境治理、节能减排等方面的投资。

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大解放，四次工业革命得以并轨进行，并取得令举世瞩目的成就，离不开邓小平提出并努力付诸实施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战略。改革开放和中国教育与文化的快速发展一直紧紧相连。从切实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到大学扩招，以及大规模派遣、鼓励和支持学生出国留学，中国用了不到二十时间，普遍提高了广大劳动者教育水准和文化素质，造就了一支百万、千万计的科技大军。辽阔的中国大地，各个地区、各个领域发展的不平衡，给他们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足够空间。生产力的发展，先进生产力的创造，归根



结底，是因为有了能够承担这一历史性使命的人。

我们围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目标，推进经济体制以及其他各方面体制改革，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实现了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飞跃，极大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极大促进了社会生产力发展，极大增强了党和国家的生机活力。中国生产力的伟大解放，空前增强了中国人民的自信心，中国充满自信地向世界开放，也更加积极、主动地面向世界。这就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历史研究，推动了将中国放在世界联系之中、在世界视野下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更为重要的是，人们由此更深刻地理解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正确认识历史中无可替代的作用。

#### 思想解放：伟大解放运动的总开关

改革开放是第二次革命，是一场用和平方式进行的革命。这一伟大的解放运动，是关系到每一个人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全面变革，是整个中华文明从物质文明到精神文明、从政治文明到社会文明再到生态文明全方位的提升，是一种崭新文明在孕育、在诞生。

改革开放作为一场伟大的解放运动，发端于党恢复并高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没有党自身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不可能打破紧紧束缚住人们的种种清规戒律，种种脱离实际的理念、体制、方法。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坚持实践第一，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从实际的前提出发，它须臾不离这个前提”。中国共产党人正是经由共和国建立以来艰苦奋斗的实践，在实践中探索、总结，发现真理、修正错误。思想解放运动的发动，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人，包括一大批曾被打倒而跌入社会底层的高级领导干部，经历了一场凤凰涅槃的产物。人们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深入了解到中国真正的实际，了解到最广大的民众真实的生产状况与生活状况，了解到原先许多教条和迷信多么严重地脱离了中国的社会实际，这就推动了人们深刻认识与总结先前奋斗的各种经

验和所走弯路的种种教训，勇敢地挣脱长时间紧紧束缚住他们的、令他们脱离中国实际和当代世界实际的各种精神的枷锁。中国共产党人发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统一了思想认识，站在全新的历史高度，决定引导全民族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及实行改革开放的科学决策。随后，中国改革一步步深化，开放一步步扩大，无一不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结果。

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史学领域，就是始终不渝地坚持信史立国，坚持将我们的认识和决策都置于真实、可信的历史的认识基础上。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 2018 年年会开幕式发表主旨演讲中说：“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征程。从农村到城市，从试点到推广，从经济体制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40 年众志成城，40 年砥砺奋进，40 年春风化雨，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中国历史学的解放和发展正是这壮丽史诗的一个部分。中国历史学的解放和发展也告诉我们，必须始终坚定不渝地反对形形色色轻侮历史、篡改历史、戏弄历史的行为。只有这样，我们方能以较小的代价赢来最大的发展，否则，我们就不可避免地会走弯路、会摔跟头。

#### 历史学研究离不开“体系”

□钱乘旦，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针对当前史学界一个流行的倾向，这种倾向不仅在中国史学界，也在世界史学界散发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研究发展迅猛。几十年中，史学研究最大的进步之一，就是研究越做越细，课题越做越小、也越做越深，和“文革”之前的“假、大、空”形成鲜明对照。这种越做越细、越做越小、越做越深的现象本身很好，历史学确实应该做细、做小、做深——不深、不细、不小，大而不当，不接地气，从空到空，这样的历史学是没有出路的，也看不到发展的前景。所以，改革开放以来四十年历史学在这方面的变化是一个进步，这是有目共睹的。

但是在这个总体发展的趋势中，有一个苗头也

日益明显,非常值得史学界注意。这个苗头就是历史学界——包括已经成熟的学者以及正在学习之中的研究生(硕士生、博士生)和正在成长中的年轻一代,自觉或不自觉地滋生出一种倾向,认为历史学研究是不需要体系的,应该摆脱体系的束缚;历史学研究是不需要理论的,理论无助于历史研究。题目小就是好,越细、越小越好。小题目无需框架,更不需要体系。至于为什么做某个题目?做一个题目要不要理论?这些问题无足轻重,为题目而题目就可以了。更有甚者,有人声称有了体系反而不好,有了理论就碍手碍脚。因此,一种“反体系”思潮广为流传,碎片化现象因而坐大。我认为,这种倾向如若继续发展,对历史学研究一定造成伤害。

关于碎片化问题,史学界——甚至整个学术界——已经讨论了很长时间。七八年前,《历史研究》曾召开一个会议,我当时就提出了碎片化问题,在场有不少学者并不在意。但是,七八年过去了,碎片化现象却愈加明显,不仅在中国,在全世界都成为问题,碎片化已经是一个世界性的学术现象,不得不引起人们的注意。

历史学研究要不要体系?答案是肯定的。体系是历史学研究的一个本质特征,或者说是最重要的本质特征之一。有了体系才有对史料的选择,才有对历史的梳理与书写,这是做历史研究的人都能体会到的。做历史研究的人都知道,史料本身是碎化的,是散乱的,需要历史学家去整理,把散乱的史料整合起来,让它们成为“历史”。历史学家的工作,第一是寻找史料,第二是整理史料,如果还有第三,那就是“书写历史”,由此而阐释史料中所包含的历史意义。无论是寻找史料,还是整理史料、书写历史,“体系”始终在发挥作用,比如,就史料而言,它存在于很多地方,各种各样的史料多极了,也很混杂。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把他自己认为有价值的史料挑选出来,梳理成“历史”。可是哪些史料有价值、值得写进“历史”呢?不同的学者会有不同的判断和不同的选择标准。通常出现的情况是:有些学者挑选这些史料,有些学者挑选那些史料,其他学者又挑其他的史料,这种情况在历史学家们看来是非常正常的事,毫无奇怪之处。可是,为什么不同的

学者会挑选不同的史料、然后使用不同的史料呢?这就涉及到体系问题了,是体系为筛选提供了标准,也为书写制定了框架。

历史学家这样做也许是不自觉的,但体系确实是客观存在的,不管历史学家有意识还是无意识,没有体系就无法筛选史料,也无法书写历史。从体系出发,某个历史学家会觉得某些史料有价值,于是挑选它们,写进他写的“历史”;其他历史学家则根据他们的标准挑选他们认为重要的史料,并书写他们的“历史”。因此,体系不以历史学家的主观意志而存在,它本身就是存在;如果没有体系,史料就永远只是史料,不能成为“历史”。

举一个不要体系的例子。北京大学出版社前几年出过一本书,中文书名是《世界:一部历史》,作者是美国人费尔南德兹-阿迈斯托。这是一部全球通史性质的书,也是一部典型的不要体系的书。作者在前言中就说,他这本书不要体系,也绝对没有任何体系。他试图把整个世界从古到今各个地方、各种人群、所有文明、一切能够找得到的东西都写进书里。书写得非常精彩,也很耐看,但我们发现,他——作为一位没有受过专业史学训练的记者作家,虽然把书写得很精彩,但素材都是信手拈来的,并未精心挑选;如果他碰巧拈到了另外一些素材,那他就一定会写出另外一部历史了。读者看完了这本书,脑子里仍然是一堆碎片,而没有成为“世界”。所以我说,体系是历史学研究的本质特征之一。

中国史学传统和世界史学传统都非常重视体系,无论自觉或不自觉,都把体系看得很重,而且有成型的体系。比如,中国史学传统从形式上说是纪传体,从《史记》开始就是这样;从理念方面说,自孔子以来,经过司马迁、司马光等,一直到现在,都强调经世致用、知古鉴今,强调史学的借鉴意义——“资治通鉴”就是用古代的东西警示现今,这是中国史学的一大特点。中国史学重视史料鉴别,因此,考证、考据在中国史学传统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是考证、考据不是中国史学研究的根本目的,鉴别史料是为知古鉴今服务的。考据之学到清代发展到顶峰,形成所谓乾嘉学派,但那是有时代背景的,就是清代愈演愈烈的文字狱。关于这个问题,史学界各位同仁都很清楚。



西方史学传统同样有体系，但它的体系更加多样化，并且随着时代变动而不断变化。从形式上说，西方叙事方法和中国的纪传体叙事有很大区别，我把它称为“时空叙事”，也就是讲故事，沿着时空一层层铺叙；另一种形式是编年体，按年、月、日记录所发生的事，这种形式在中世纪相当普遍。从理念上说，西方历史学强调求知，也就是以追求知识为目标，想知道过去发生了什么，把求知作为非常重要的理念。但即便如此，它仍旧重视对历史教训的探求，其中最典型的就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修昔底德写这本书，试图找到战争中的教训，尤其是雅典失败的教训。可见，求取教训在西方历史学的源头就已经是传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

进入中世纪，中世纪的史学基本上是一个神学的体系——《圣经》的框架，教会的体系。各种史学书籍、著作等，都跳不出《圣经》的规范，以《圣经》作为解释与理解历史的框架。到了近代，近代前半段，从15世纪（或更早）到大约18世纪中叶，是一个文艺复兴的体系，它逐渐突破中世纪的神学体系即教会体系，打破了《圣经》框架，而形成一个人文主义的框架，无论从伏尔泰的《路易十四时代》，或者从意大利的一些人文学者书写的史学著作中，都可以看到这个特征，即文艺复兴的体系、人文主义的框架。

近代的后半段，从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西方史学又出现新的变化，这和那个时代的背景密切相关：科学技术、工业革命等影响到历史学，就形成一个“科学的”体系和兰克的框架。兰克标榜他的历史是“科学的历史”，这个影响非常大。欧洲其他地方也出现类似情况，比如说英国阿克顿勋爵牵头写作的多卷本巨著《剑桥近代史》，差不多也是这种性质。

到20世纪，某一个主流体系独大为宗的情况慢慢消失了，而越来越趋向于多样化和多元化。进入21世纪，多元化的倾向就更加明显了，各种“体系”越来越多，最后多到了杂乱无章，不得不用一个“后现代”的大口袋把它们套进去。尽管如此，审视20世纪西方历史学的发展，史学家们对体系的探索一直在持续，他们一直在尝试构建新的体系，

并试图将其构建成为主流的体系。

比如，20世纪上半叶，有汤因比、斯宾格勒为代表的文明史观，西欧很多国家及美国则出现经济史和社会史，英国的屈维廉就是早期社会史的著名代表。再比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出现边疆理论，这也是一种体系，带有强烈的理论色彩。20世纪下半叶英国形成西马学派，这是一个有很大影响力的学派，它有独特的理论，有自己的体系。法国的年鉴学派也是这样，有自己的体系，有自己的理论。差不多同时，社会史在西方蔚然成风，但二战以后的社会史和20世纪早期的社会史不同，它是一个“没有政治史的”宏大历史，包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它看起来非常琐碎，但是有它的框架和理念。再往后，全球史出现了，这是一个庞大的历史框架，它那种“横向”构建历史的方式，在历史学研究中显然另辟了蹊径。而最近这段时间，在史学研究碎片化甚嚣尘上的时刻，又有人试图去构建新的体系，于是就出现了“大历史”：大历史把宇宙万物、天地人神全都写进历史书，并且说这才是真正的“历史”。由此可见，在西方史学传统中从来就不缺乏“体系”，只是“体系”太多、又不断发生变化而已。

但是从20世纪下半叶起直至现在，碎片化的现象却愈演愈烈了，许多人越来越倾向于不要体系，抛弃所有框架，而把历史等同于神话，把写历史看成讲故事。历史学受到后现代主义的巨大冲击，变得越来越碎片化。后现代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解构，它解构一切。历史学正遭遇后现代主义，它的体系正在被解构。这就是历史学正在面临的重大危机。

说到这里，必须回答什么是体系？这当然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关于“体系”的理解显然很多。我认为历史学的“体系”就是在历史学研究中确认一个思维框架，把研究放在这个框架里进行。思维框架当然和历史研究的理念相联系，因此必定有某些理论的指导。如此回答也许太简单，但我认为是有道理的。就体系而言，框架是关键，框架的边界就是理论。就具体研究工作而言，题目不在于大小，而在于有没有框架：一个很小的题目也可以“以小见大”，关键在于有没有体系。没有

体系、没有框架，再大的题目也只是碎片。所谓碎片化，并不是说题目小，而是不存在理论框架。小题目也可以做出大历史；相反，很大的题目，无数的史料，一百万、两百万字的篇幅甚至更多，也可能写出一大堆碎片。所以，题目不分大小，篇幅不分多少，关键在于有没有体系。

现在有很多研究生论文就存在这个缺点：没有体系，没有框架，只是一批史料的堆积。如果这只是写作技巧或处理不到位的问题，那还情有可原。但现在很多人其实从思想深处就反对体系，认为史学研究不需要体系，甚至应该有意识地摆脱任何体系。尽管出现这种思想倾向是有原因的，但历史学研究确实不可能没有体系，因为体系是客观的要求，是历史学研究的本质特征之一；离开了体系，历史学研究便无从下手。

由此说到大众史学问题，它和体系问题有关联。葛剑雄先生近期发表一篇文章《大众史学未尝不可以碎片化》。我觉得他的提法不是没有道理，因为通过大众史学这样一种传播方式，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了解各种历史知识，提升全民的历史知识水平，确实非常重要。但大众传播毕竟不是系统学习，于是就很容易出现“碎片化”，也就是一般民众得到的历史知识很零碎，难以形成整体的历史观。

现在，在中国国内，历史学已经从谷底慢慢升起，从冰点升温，越来越热，对于专业史学工作者来说，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是一件振奋人心的事。但需要指出的是：作为专业的史学工作者，不仅要向大众传播历史的知识，也要向大众传播历史的价值理念。而历史的价值理念是什么？它体现在体系中。专业的史学工作者在向大众传播历史知识的同时，尤其要注重传播历史的价值和历史的理念，否则，大众史学就会变成全民娱乐。现在，很多东西都变成全民娱乐了，各领域都出现娱乐化现象。一旦大众史学也成为全民娱乐，变成了饭后茶余的消遣对象，那么大众史学也就变成笑料了，变成了“戏说乾隆”。所以，专业史学工作者应该引领大众史学的方向，从史学研究的本质特征出发，注重传播历史的价值。

## 昨日到城市——城市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苏智良，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城市的出现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之一，城市是人类集聚的主要地区，尤其是工业革命以来；对城市史的研究则有助于我们回顾城市化进程，总结得失优劣，并更好地选择未来的生活方式。改革开放的40年是中国城市化高速发展的时期，城市史研究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推进。

### 中国的城市史研究概况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历史典籍中很早就有关于城市的记载。《周礼·考工记》写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从中可以一窥中国最早的城市规划及城市建制与王权、宗教、社会等级的关系。中国古代城市中防御、政治、工商、宗教、教育机构按照一定的规制与布局建造，布局体现了权力的空间分布，影响着人们的心理与行为方式。在古代中国，城市空间布局讲求天圆地方、天人感应、阴阳五行的文化内涵，这也是中国人的宇宙观、权力观、伦理观以及审美视觉在空间上的体现。

中国古代的城市布局内涵丰富，体现着中华文明的独特气质。古籍诸如《洛阳伽蓝记》《长安志》《唐两京城坊考》《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宋东京考》等，保存着诸多关于城市的记录和考察。而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史研究却是发轫于1980年代。城市史在中国的兴起，既是20世纪西方新史学影响中国史学界的结果，也是中国学者紧跟国际学界研究动态的一种体现。

城市史属于新文化史的一个分支，是新史学发展的成果。1950年代开始，“新史学”对以兰克为代表的传统史学发起了强劲挑战，在新史学的研究策略中，历史学家的目光不断下移，之前不入历史学家法眼的社会史，逐渐取代了政治史，成为史学研究的主流。到1970年代，“社会文化史”又成为

西方史学界的新宠。城市是承载社会与文化的熔炉，故在城市史研究中运用新史学的研究方法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城市史研究涵盖的领域非常广泛，不仅研究城市的起源、嬗变，研究城市本身的历史与文化，研究城市与人、自然之间的关系，研究城市设施、居民生活与礼俗的变迁，而且还要研究那些有关城市的理论。

自 1920 年代以来，西方世界陆续成立了城市史研究的专业组织。海外学者在对本国的城市研究成型之后，开始把目光转向了中国的城市，最早对中国城市采用“社会文化史”的视角进行研究的，正是这一群外国学者。1953 年墨菲出版《上海：近代中国的钥匙》，1977 年施坚雅的《中华帝国晚清的城市》问世，他利用“中心地理论”以市场为基础进行区域研究的思路，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城市史研究。1978 年鲍德威出版《中国的城市变迁：山东济南的政治与发展（1890-1949）》，1984 年罗威廉出版《汉口：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几年后他的另一著作《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社区（1796-1895）》问世。以上著作都是西方学者采用“新文化史”、“社会文化史”的视角研究中国城市的典范。

随着改革开放，国门打开，中国的历史学家开始采取西方城市史研究的视角与方法来研究中国城市。国家“七·五”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中，将上海、天津、武汉、重庆四个城市的历史研究列为重点项目。陆续出版了张仲礼先生主编的《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990 年）、隗瀛涛先生主编的《近代重庆城市史》（1991 年）、皮明麻先生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1993 年）和罗澎伟先生主编的《近代天津城市史》（1993 年）。它们的共同特点是篇幅浩瀚、内容丰富、材料翔实，叙述通畅而观点新颖，历史与现实感俱强；它们都以城市的早期现代化历程为主线，透视城市内部各方面的发展状况，展现城市发展的阶段性波动，总结城市发展的特点，揭示城市发展的规律。国家“八·五”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中，又将“中国近代不同类型城市的综合研究”“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考古学研究”“城市学”作为重点课题。这些措施成为城市史学科快速发展的催化剂，推动了中国的城市史研究发展。

在早期的中国城市史研究中，上海可谓研究重镇与核心。上海作为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重镇，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上海本身是近代中国城市中最重要研究对象，二是以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为代表的学术力量，对于中国近代城市的研究起到了先导作用。上海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早在 1881 年《申报》就将上海比作东方巴黎了，稍后更将上海誉为“英之伦敦，法之巴黎，美之纽约”。笔者认为有两个方面应当引起重视：一是开埠后大量外国人涌入上海，华洋共处，三界四方，这形成了传统与现代、西方与东方、政治本位与经济先导之间的激烈交锋；二是上海是中国最为富裕的江南地区的门户，富饶的江南是上海的腹地，这样就形成了“上海的江南”与“江南的上海”的良性互动。

当然，上海史走在了全国城市史研究的前列，与前辈学者的努力也是分不开的。早在 1930 年代，以柳亚子为馆长的上海通志馆就悉心搜集资料，1934 年、1935 年出版《上海市通志馆期刊》。上海社科院经济所在 1950 年代起整理了《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大隆机器厂的产生、发展和改造》《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1921-1957）》《恒丰纱厂的发生、发展与改造》。1960 年代上海社科院经济所整理出版《上海钱庄史料》《荣家企业史料》《永安纺织印染公司》和《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也出版了《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和《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等，这些资料为 1980 年以后上海史的繁荣奠定了良好的资料基础。

1980 年代之后，上海史研究高歌猛进。代表性著作有刘惠吾主编的《上海近代史》、唐振常主编的《上海史研究》、张仲礼主编的《近代上海城市研究》、熊月之主编的《上海通史》，另外还有陈从周等的《上海近代建筑史》、马光仁主编的《上海新闻史》、邹依仁的《旧上海人口变迁研究》《上海七百年》、陈科美等的《上海近代教育史（1843-1949）》、乐正的《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上海百年文化史》等。进入 21 世纪，各类上海城市史专题的著作更是选题多样，不胜枚举。

另外，从城市发育、发展的历史逻辑看，任何一个特定区域的城市都经历了从零星散布的单体城



市到形成城市集合、城市体系的演化历程，城市史的研究也沿着同样的逻辑演进。1980年代，中国近代城市史从单体城市史研究起步，其后逐渐进入对群体城市和区域城市史的关注。与单体城市史的研究不同，区域城市史的研究对象是特定空间内一组性质、类型、规模各异但又相互密切联结的城市，即一个城市集合体。从这个角度讲，上海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关系非常密切。张仲礼主编的《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长江沿江城市与中国近代化》，茅家琦主编的《横看成岭侧成峰——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戴鞍钢的《港口、城市、腹地——上海与长江流域经济关系的历史考察（1843-1913）》，都是对该领域的有益探索。

在微观方面，深入寻找市民生活的空间（街区、胡同、弄堂、院落）、景观、城市中的人与日常生活方面的佳作，也层出不穷。如卢汉超的《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王笛的《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与微观世界1900-1950》等。

为了推进中国城市史的研究，2012年8月，数十位学者云集沪上，成立了中国城市史研究会。该会的成立，有力推动中国城市历史的研究。1988年创刊、由天津市社科院主办的《城市史研究》，至今也已走过30年历程，并成为城市史研究会的会刊。

#### 对城市史研究的展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的迅速发展要求出现与之匹配的城市化研究，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使得城市史成为中国社会史研究领域成果最引人注目的一环。有学者认为近二十年城市史研究的最大变化体现在以下四点：其一，在个案选择上日益摆脱集中于以上海为代表的口岸城市窠臼，深入近代中国内地城市。其二，在研究方法上发生了从传统政治史到社会史再到文化史的路径转移。其三，在研究阶段上前后拓展，明清及新中国成立后两个时段日益受到重视。其四，在研究旨趣上已摆脱从“传统”向“现代”的单向过渡，开始在模糊二者边界的过程中剖析二者在近代中国历史变迁中交织黏合的复杂性。

城市史研究中出现的众多转折有利于其研究的

深化，笔者认为中国的城市史研究要在以下方面创新。

其一，城市史研究需要新方式、新视角。中国的城市史研究的路径，正如张利民所指出的，城市史研究是从个案起步，逐渐扩展到群体城市、区域城市、不同类型城市以及制度、体制等各个层面，以阐述城市发展脉络，探求其特点与个性，构成了城市史研究的基础。随之，研究者将城市置入区域或更广阔的空间环境、网络系统，研究城市与周边的关系、城市的定位以及城市间的比较等。城市研究达到一定的深度，就需要在研究视角上有新的突破。笔者认为在今后的城市史研究中要加强对城市公共空间和城市景观的研究。

中国的历史学研究着眼点多在于人类活动的时序性变迁，之前的研究欠缺对活动发生的载体之一——空间的研究。“空间”长期以来被视为是一个静止的存在，但随着近几十年来众多学科对空间展开全新的研究，“空间”被赋予了政治、社会、文化、时间、结构、美学等多重社会内涵。城市作为一种文明形式首先是以空间形态出现的，空间也是城市记忆的载体。从这个意义上说，城市研究本质就是空间研究。近年来，历史学家也日益把“空间”作为一种研究工具。空间跟历史一样，不是静态的、自然的现象，而是持续或间断的建构变动，既是社会文化的产物，也是社会文化实践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向度。

研究城市空间最重要的是研究城市空间所体现出来的社会文化意义。笔者曾经从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出发，提出城区史的研究范式，倡导以城市空间内部组成——小尺度的城区为单位，开展多学科交叉的城区史研究，以期对城市史进行更为精细多元的重构。在关于城区史的方法论问题上，笔者将地理学方法置于重要的地位，对城隍庙、静安寺、徐家汇、提篮桥、外滩等16个上海历史城区的物质空间与社会空间演变过程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内容涉及城区发展中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人口、日常生活、公共空间、居住空间、活动空间、意象空间等各个领域，并在此基础上对上海城市历史的内部结构形成了新的认识。对于大中型城市中不同空间的解读，有利于加深我们对此城市的理解，以

准确把握城市发展的特征、功能演变和路径。

笔者合作的团队目前进行的上海城市研究,另一方向是加强对城市传统景观的现代化方法呈现。上海城市人文历史地图的制作,通过上海城市历史景观数据库的设计与构建,力图在数据库中集中展现上海各个时期的景观。我们尝试将城市聚落类型分为花园洋房景观数据集、普通里弄景观数据集、棚户区景观数据集、城乡结合部景观数据集等。从城市产业类型上可分为商业、金融、工业、公共事业景观数据集等。从城市文化类型上可分为娱乐、宗教、教育景观数据集等。在此基础上,采用历史发生学原则对不同类别景观的空间分布、组织结构、历史演变、影响因素和其所涉及的社会背景、重要事件等进行分析,构建景观史研究的重心。在该部分中,地理学传统的景观形态分析方法、景观感知分析方法,甚至包括社会学、心理学、美学、建筑学等相关学科的方法,为综合进行上海城市景观史研究提供了必要的基础。

其二,城市史研究要借鉴其他研究的方法与成果,实现跨学科的综合研究。中国的城市史研究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历史学的方法自不待言。城市史研究需要借用社会学、人类学、考古学、地理学、建筑学、规划学、生态学、经济学等方法。在跨学科研究方面,城市环境史的兴起为我们综合多学科的研究方法提供了良好的范例。环境史是在战后现代环保运动推动下所产生的历史学的新的次分支学科,其研究对象是历史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以及以自然为中介的各种社会关系。环境史的出现为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合作搭建了桥梁。跨学科研究方法也就成为环境史最重要的研究方法。环境史研究必然要大量借鉴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考古学、政治学、法学等研究领域的成果。环境史学的自然方面则涉及地质学、生物学、生态学、气象科学、水文学、物理学和化学等学科的一些基本知识。城市环境史很可能成为新的学术热点,它要研究人与自然的的关系在城市这个特殊空间载体里遇到的种种挑战,运用多学科知识是解决这些挑战的前提。

其三,要不断开拓城市史的研究领域。随着城市史研究的深化,我们要在时间和空间两个层面拓

展中国的城市研究。在时间层面,我们要把中国的城市史研究尽量还原到城市开始形成的原点,从而在一个历史的长河中研究城市。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的城市发展到今天是古代城市积累的结果。在空间层面上,我们要加强对中小城市的研究,加强大城市与中小城市的联系研究。中国的城市史研究有着自己悠久的历史传统文化传统。但是我们今天对古代城市的研究还很薄弱,结合文献、考古资料综合研究古代城市的能力还很欠缺,在以后的研究中要加强对这一领域的关注。区域性大城市史的研究相对深入,宁波、福州、厦门、南京、苏州、长沙、成都等沿海沿江区域中心城市史研究也已取得相当成果,拉萨、南通、昆明、长沙、秦皇岛、包头、青岛、烟台、鞍山、本溪、开封、成都、济南、宁波、景德镇等城市亦都已有专史论著问世。而对区域性次中心城市、市镇,尤其是内陆地区的中等城市 and 市镇,则缺乏应有的关注。特色鲜明的小城镇的历史研究未来应该有较大突破。

其四,加强城市史研究中的比较研究。比较研究是历史研究中一种重要的方法,这在城市史研究中必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城市史的比较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进行中外城市比较研究,比较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城市在起源、发展、功能上的异同;二是对古代城市与现代城市的比较研究,着眼点应该放在古今城市的类型与功能上;三是对中国不同类型和不同地区的城市进行比较研究,例如北京与上海的城市定位不同,北京的定位是中国的政治、文化、教育中心,而上海的定位是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和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城市定位的不同对城市发展所起的作用不同;四是可就某一城市的不同发展阶段进行纵向的比较,从而研究城市成长过程中不同阶段的作用。近年来,城市史比较研究已经引起了海内外学界的重视,未来应是中国城市史研究的一个活跃地带。

正如吴良镛教授所言的那样,几千年来城市成为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发展的重要载体,其内容丰富而浩瀚,我们尚需积极开拓。今天必须要做的一个工作就是对尘封历史进行刮垢磨光,进行科学的整理,重新闪现它的光芒。

编辑 杨义成

# ABSTRACT

## **New Life Philosophy: Emerging Technology and Construction of Open Ethics**

**Han Danyuan & Sun Zhouxing & Zhao Tingyang & He Huaihong & Wang Guoyu & Duan Weiwen**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nanotechnology, genetic engineer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other emerging technologies has aroused widespread concerns and discussions. Emerging technology offers the possibility of a happy life for mankind, but it also brings mankind to an uncontrollable future. It is not only the sword of Damocles hanging over our head, but also the Pandora Box in front of us. It is precisely because it is related to the integrity of human subject, human dignity and human status in the natural world, which leads to deep thinking and debate on bioethics and law, life value and the fate of mankind in the academic circle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ve posed a series of important challenges and propositions to mankind, and we must respond to them. For example, how to re-advocate a new philosophy of life and keep the final boundary of natural human beings? Whether and how to make a systematic assessment of the new technology and its consequences, and make a comprehensive plan for the future shape of human life and civilization? How to construct a preventive ethics and law to control the risk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rom the source? How to find the boundaries of certainty in uncertain times and then construct an ethic of uncertainty. And some other questions. For these problems, it is urgent to seek consensus through continuous discussion and even contention. To this end, *Exploration and Free Views* invited well-known humanities scholars and important experts in the field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thics to discuss and provide their own possible solutions. It is published here for the readers. It should be pointed out that the expert arguments in this album only represent personal opinions and do not represent the position of the editorial department. Scholars are welcome to express their opinions and further participate in and promote discussion.

## **Academic Response in the Age of Great Change**

——**Sociologists and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Zhou Xiaohong & Zhao Dingxin & Zhai Xuewei & Xu Yongxiang & Wen Jun & Feng Gang &  
Chou Liping & Zhou Yi & Zhang Letian**

**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ese society has undergone profound changes in many aspects. On the one hand, China is currently a strong country with a well-off population, and its education level and average life expectancy are constantly improving. Every year, more than 100 million Chinese travel around the world. On the other hand, the lack of creativity,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public health and population problems, the deficiencies of government management, and the value crisis have brought challenges to China's further development. Faced with this era of great change, Chinese social scientists, as supporters, participants and observers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have done a lot of researches on various problems emerged out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They have put forward a lot of valuable suggestions to the government and have made tremendous contributions to the stability of Chinese society and the success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On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Sociology Forum" was established. Nine sociologists discussed the theme of "academic response in the era of great change", demonstrating the charm of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and the strength of Chinese sociology.

## **New Development of History Discipline in the Past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Ideological Emancipation and System Construction**

**Ma Keyao & Jiang Yihua & Qian Chengdan & Su Zhiliang**

**Abstract:** On October 13th to 14th, 2018, the "Annual Working Conference of the History Department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Social Science Committee (Seminar on New Areas, New Problems, New Methods and Development of History Discipline)" was held in Zhejiang University. More than 40 scholars have conducted extensive and in-depth discussions. Most of the participants have focused on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new problems and methods in the new field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in the past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made a summary and reflection. From the conference, we know that the study of history in China is organically combining the study of Chinese history with that of world history. China's historiography has also made considerable progress in exploring new fields such as environmental history, urban histor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istory, public



history and so on. Chinese historians have been deeply reflecting on the difficult course, the current research situation and lessons to be learned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in modern times. Here are the speeches made by several scholars at the conference. They put forward their views on the above issues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 **From the King to the People: The Metaphor of "Two Bodies" Transformed, or Rejected**

**Tan Ankui**

**Abstract:** Some Chinese scholars attempt to apply the classic fiction in the medieval political theology in England, "the king's two bodies", to modern politics in opposite ways. But this metaphor will give rise to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conceptions of the organic state and that of the modern abstract state whether it is interpreted extensively in temporal or spatial dimensions. The problem of the abstract state is essentially on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abstract sovereign peopl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dividualism. The crucial point of modern politics lies in the abstract and visual forms of the people and their relationship, and it is radically different from "the people's two bodies". For the popular sovereignty, the rational justification of political legitimacy enjoys its priority over the experiences of the sacred in political life. As a result, the continuity and identity of the modern political community are ensured by those normative principles ground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overeign people and the continuity of their institutional embodiment, not by the framework of the political theology behind the metaphor of "two bodies".

**Key words:** king's two bodies; organic state; abstract state; people's two bodies; construction of the people

### **The Study of Political Theology in Plural**

**Xu Zhenyu**

**Abstract:** The study of "political theology" has received increasing attention, but the concept is rather ambiguous and needs to be observed in the context of "dialogue". Although there are intersections and overlaps, it is still necessary to distinguish among three political theologies: political theology under the Christian tradition, political theology in Karl Schmitt's sense, and political theology with a broader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t is more hopeful to combine relevant researches with Chinese reality i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hird sense of political theology.

**Key words:** political theology; modernity; Karl Schmitt; Ernst Kantorowicz

### **Is There a Comparative "Political Theology" Between the West and China**

**Li Teng**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study of political theology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sperous. Besides using the term to interpret the Western world, some scholars also apply this concept to analyze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concept of political theology has a storing western historical background, based on the apocalyptic religion and emphasizing interactive process between the secular politics and theological thoughts. Although scholars in the 20th century often regarded the 17th century's deism as the beginning of political theology, it truly originated in the High Middle Ages. Through the re-examin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theology in Western history, we can make a more accurate judgment of its applicability in Chinese historical context.

**Key words:** political theology; Carl Schmitt; Ernst H. Kantorowicz; comparis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 **Bottom, Unity, or Upside Down**

####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andard of Minimum Living and the Standard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Rural China**

**Han Keqing**

**Abstract:** As two basic systems of anti-poverty policy in rural China, the minimum living guarantee (MLG) and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development (PAD) are playing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guaranteeing the basic life of the poverty groups and eliminating the absolute poverty in the countryside. At present, under the policy mobilization to win the Battle Against Poverty, the standard of rural MLG is getting higher and higher. Through combing the